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日本海外移民政策的巴西转向及特征

杜 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近代晚期, 日本移民作为融入全球移民大潮中的一个群体, 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和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产物。20 世纪 20 年代初, 日本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 推动了其海外移民政策的重大转向。日本政府将国内问题和海外移民问题统筹考虑, 将向拉美移民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举措, 确定了“共存共荣”的海外移民方针, 实施国策移民政策, 将移民重心彻底转向巴西。此后十年, 日本向巴西的移民活动步入高峰, 巴西成为日本海外移民的首要目的国, 而日本也成为巴西的第二大移民来源国。与向巴西移民初期相比, 1924—1934 年日本移民高峰期在移民身份、移民模式、移民来源地和居住国的地理分布方面表现出相似性, 而在移民资金来源和移民类型方面则展现出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 日本; 巴西; 移民政策; 国策移民; 帝国经济会议

中图分类号: K151; D831.3; D87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5) 05-0114-12

世界体系是具有广泛劳动分工的社会体系, 包括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等要素。^① 国际移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而迅速扩展。日本移民作为近代晚期融入全球移民大潮中的一个群体, 在移民动力、移民模式和移民特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既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和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产物, 又对日本及其移民住在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外交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 日本的海外移民政策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1858 年“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锁国时代的结束, 幕藩体制随之分崩离析, 这为日本海外移民潮的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1868 年, 明治政府开启了日本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盘西化和现代化革新运动。这一运动在推动日本近代化的同时, 也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随着革新的深入、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 日本人口急剧膨胀。在扩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为了解决人口增长过快与有限社会资源之间的矛盾, 明治政府开始鼓励向海外移民。1884 年, 日本和夏威夷签订了《日本人民夏威夷渡航议定书》。此后十年, 共有 29 132 名日本契约劳工前往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做工。^② 由于这一时期的移民行为是由日夏两国政府签约和主导的, 史称“官约移民”时代。此后, 明治政府的经济政策重心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4&ZD30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 (20@WTZ008)。

作者简介: 杜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美洲史。

①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1 卷, 尤来寅等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第 460-462 页。

② Daniela de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 The Nikkeijin*,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3.

发展官营企业转变为扶持民营企业，与之相应的是日本移民活动的主导机构也由政府转变为民营移民公司，海外移民活动逐步步入“私约移民”时代。

除了纵向层面移民政策的转变，在横向层面，如果从历史长时段来看，日本海外移民的重心呈现出动态变化。1868—1900 年，日本移民的前三大目的地分别为夏威夷（90 572 人）、美国（30 130 人）和加拿大（8891 人），而在整个拉美地区，日本移民不足千人，仅占同期日本海外移民总数的 0.5%。1901—1920 年，夏威夷（128 124 人）和美国本土（61 018 人）仍然位居前二，拉美地区（60 731 人）取代加拿大成为日本海外移民的第三大目的地，占同期总额的 19.3%，其中巴西、秘鲁和墨西哥接收了最多的日本移民。1921—1930 年，拉美地区接收的日本移民达 85 342 人，跃升为日本海外移民的首要目的地，占同期总额的 53.3%，其中 83% 的日本移民选择了巴西，而亚洲和南太平洋地区（26 333 人）升至第二，美国本土（16 105 人）降为第三。^① 由此可以看出，拉美地区尤其是巴西，在日本海外移民政策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目前，巴西是拥有海外日裔群体最多的国家。那么，究竟有哪些因素推动着 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海外移民政策最终转向巴西？日本新的移民政策又是如何确立的？这一时期巴西的日本移民活动又呈现出什么特征呢？学界既有研究大多关注 19 世纪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变及其向夏威夷和美国的移民活动，也有学者从宏观的视角探讨日本的海外移民活动或美洲的日本移民，但较少涉及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移民政策调整的背景和过程，尤其是从纵向比较不同历史时段日本移民活动的特征。^②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移民推拉理论和相关文献档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移民政策调整的历史背景

日本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但其付出的代价非常小，相反却大发战争财，资本主义经济空前繁荣。战争期间，各协约国为了弥补战略物资和军需品的不足，不断进口日本商品，日本资本主义借机垄断了国内市场，独占了东方市场，并在欧洲市场中抢占了一席之地。日本完全扭转了之前对外贸易中的入超地位，4 年间的出超总额达 14 亿日元。^③ 与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处境每况愈下，社会潜伏着重重危机。在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在大地主手中，沉重的租佃、粮价的不稳以及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都加深了农村贫困化问题。在城市，商品价格飞涨，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不升反降，百姓生活困苦。农村的租佃纠纷和城市的劳资纠纷不断增加。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着世界范围内的工农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增强了日本底层人民斗争的信心。1918 年 8 月 2 日，日本宣布出兵西伯利亚。从表面上看，日本是为了增强协约国的兵力，早日结束战争，但其真实意图是武力干涉布尔什维克政府，并企图在西伯利亚攫取特殊权益。

^① Toake Endoh, *Exporting Japan: Politics of Emigration to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 18.

^② 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的代表作有杨捷《近代夏威夷华人与日本人的经济关系——以种植业、商业和渔业为中心的考察》，《全球史评论》2016 年第 1 期；吴占军《近代以来美国本土日本移民的分期及特点（1868—1941）》，《日本研究》2018 年第 3 期；张世春《日本移民在拉美》，《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1 年第 20 期；杜娟《近代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变》，《北方论丛》2021 年第 3 期。国外学界相关研究的代表作有丸山浩明编著『ブラジル日本移民：百年の軌跡』東京：明石書店、2010；入江寅次『邦人海外発展史』東京：原書房、1981；日本移民八十年史編纂委員会『ブラジル日本移民八十年史』東京：ブラジル日本文化協会、1991；Daniel M. Masterson, *The Japanese in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Toake Endoh, *Exporting Japan: Politics of Emigration to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Akemi Kikumura-Yano, *Encyclopedia of Japanese Descendants in the America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Nikkei*,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 2015；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9.

^③ 坂本太郎《日本史》，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41 页。

1917—1918年,日本粮食严重歉收,出兵西伯利亚又需要大量储备军粮,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短缺。于是,投机商人开始加紧收购大米,导致米价飞涨,每升大米的价格从1917年的12钱上涨至1918年的53钱。^①1918年8—9月,日本爆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大暴动——“米骚动”。起义民众不仅追求提高工资、降低物价等经济目标,还提出了推翻寺内内阁的政治要求。对此,日本政府软硬兼施,调动军警粗暴镇压抗议民众,同时采取救济饥民、打击不法商人、增加大米进口以及从西伯利亚撤军等举措来稳定米价。

尽管“米骚动”渐趋平息,但它增加了日本政府的统治危机感。为了缓和矛盾、恢复国内政治秩序及安抚民众的不满情绪,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提高社会底层群众的工资和福利,提供赔偿,促进就业和实施援助;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度,加强政治民主化进程。此外,向海外输送移民也成为日本政府释放社会压力的“解压阀”,移民问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与国家安全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922年,日本军官晴海京平在军部官方杂志《偕行社记事》中发文,他在分析日本人口和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提出移民是缓解人口压力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②除了民众运动,1923年关东大地震也加剧了日本社会失序的局面。这场强震导致约10万人死伤,并引发了火灾和海啸等次生灾害,给日本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约丧失其(日本国库)八分之二”^③。为了进口国内匮乏物资,日本对外贸易陷入巨额入超,继而引发了1927年的经济危机。震后,除了救灾、减灾、修缮、重建、救助和安抚等工作,还有一项重大问题亟待解决,那就是如何安置数量庞大的受灾民众。在国内政治空气紧张、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将一部分灾民转移至海外生活成为日本政府的一个选择。1924年,内务省为第一批110名地震灾民提供移民补助金,将他们输送到巴西。20世纪20年代,美国再次收紧其移民政策。1908年美日《君子协定》的签订,虽然宣告日本大规模向美国输出契约劳工时代的终结,暂时降低了美国国内的排日声浪,但并没有阻止日本人移民美国的脚步。大量“照片新娘”的到来,提高了美国日侨的出生率。在1909—1920年入境美国的日本移民中,女性移民占39%,仅西雅图和旧金山两个城市就接收了近7000名日本“照片新娘”。^④“照片新娘”在促进日裔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极大改变了美国日裔群体的男女性别比例。1900年,在美日侨85437人,男女比例高达4.86:1;1910年,在美日侨151832人,男女比例降至3.47:1;1920年,在美日侨达到220284人,男女比例进一步降到1.59:1。^⑤随着日裔人口迅速膨胀及其土地占有面积不断增加,再度激发了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和排日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本土尤其在加利福尼亚地区再度掀起了全面禁止日本移民的运动。排外主义者以“照片新娘”无视女性人权为由,呼吁立即禁止这种婚姻模式。1919年加州甚至还专门成立了排日协会,以抨击日本移民的“照片结婚”方式。经过日美两国的交涉,1921年2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不再给“照片新娘”发放护照。

此外,美国排日势力还将斗争矛头指向日本移民拥有土地,不断挤压日本移民的生存空间,以达到禁止和驱逐日本移民的目的。日趋合理的性别结构和稳定的家庭关系,改变了早期赴美日本男性移民的心态和生活模式。他们逐渐转变了衣锦还乡的“寄居客”心态,期盼在美国定居,并从雇佣劳动中脱离出来,投入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农业生产,土地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尽管1913年加州颁布的《外籍人土地法》规定,没有资格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外籍人无权拥有土地,但日本移民利用该

① 叶昌纲《谈日本“米骚动”的社会背景》,《山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② Captain Harumi Kyōhei, “Burajiru to sono ishokumin no kenkyū,” cited in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58.

③ 《日本灾后损失之统计》,《申报》1923年10月11日,第6版。

④ Akemi Kikumura-Yano, *Encyclopedia of Japanese Descendants in the America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Nikkei*,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 2015, p. 279.

⑤ Akemi Kikumura-Yano, *Encyclopedia of Japanese Descendants in the America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Nikkei*,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 2015, p. 310, table 10.2.

法存在的诸多漏洞,如以在美国出生、有归化入籍权利的二代日裔的名义购买土地,并以监护人的身份实际经营土地,或者成立白人持股较多的空壳公司帮助日裔规避购地限制,继续购入和租赁土地,所以其在美农业生产并没有受到较大的影响。其中,日本移民的甜菜种植成绩比较突出。在爱达荷州,1913 年约 1/3 的甜菜耕地由日本人经营,占地近 80 00 公顷,日本人还利用 10 000 多公顷的土地耕种其他农作物。1914 年,犹他州日本移民的甜菜种植面积近 4500 公顷,占该州甜菜耕地总面积的 1/10。同年,在科罗拉多州,日本移民拥有 12 500 多公顷的甜菜种植园,他们还购有土地近 500 公顷,租种土地 25 000 公顷,其中近 9000 公顷以现金的方式租赁,其余的 16 000 多公顷以参股的方式租赁。^① 总体上,1913—1920 年,日本移民在美国的土地租赁面积从 62 923 余公顷扩大至 77 760 余公顷,土地所有面积也从 10 807 余公顷增加到 30 257 余公顷。^②

日本移民在农业领域取得的成就让美国人感到嫉妒和恐惧。1920 年,加州议会通过了新《外籍人土地法》,规定禁止向日本移民租售土地,禁止任何日本移民持主要份额的公司租赁或购买土地,禁止非本国公民对本国公民的土地使用权执行监护权。此后,美国又有 12 个州效仿加州颁布了外籍人土地法。1923 年,加州政府再度颁布了更为苛刻的《外籍人土地法》。至此,日本移民在美国经营土地的渠道被一一封堵,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

在契约劳工、子女教育、“照片婚姻”和经营土地的权利相继被美国排日势力剥夺后,归化入籍权成为确保日本移民地位的最后一丝希望。然而,1924 年美国颁布的《1924 年移民法》将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的排日运动推向高潮,同时打破了日本移民对在美国生活的所有幻想。根据该法,每年入境的各国移民人数不得超过该国 1890 年在美国的侨民人数的 2%,每年的移民总限额为 16.4 万人。该法将世界分为三种地区:一是配额区,指欧洲、近东各国、澳洲和非洲;二是不加限制区,即美洲各国和西印度群岛;三是无资格区,指远东各国和不属于美国管辖的太平洋诸岛。根据该法,日本被划分为第三种,即无资格归化为美国公民的外国人,且不能以移民身份入境美国。美国的大门对包括日本移民在内的亚裔群体完全关闭。

从表面上看,美国《1924 年移民法》是为了控制移民的数量和质量,确立以民族来源为基础的配额制度,将对移民的挑选从个体转变为群体。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对移民群体的划分体现出其地区偏好和种族主义立场。该法鼓励引进西北欧移民,限制东南欧移民,排斥亚洲移民,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此外,为了禁止在亚洲以外出生的亚裔群体入境,该法还规定:只要有 1/2 或 1/4 亚裔血统的人均不得移民美国;美国公民的亚裔家属也禁止入境;与亚裔人群通婚的美国人将失去公民资格。按照美国《1924 年移民法》的规定,每年移入美国的人数不得超过 1890 年该国在美国移民人数的 2%,任何国家的最低配额不低于 100 人。根据美国 1890 年的人口普查,当时在美的日本移民为 2039 人。也就是说,日本获得的入美配额为 40 人,比规定的 100 人最低配额还要少,因此即使《1924 年移民法》中不加入排日条款,日本移民也自然被排除在外。但排日条款还是赫然在列,足以见得当时美国排日势力的强大和种族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的排日运动,一方面沉痛打击了日本人愈加膨胀的民族自豪感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日本人一直为明治维新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也在努力摆脱亚洲落后国家的身份,跻身于西方世界。尤其是取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后,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大为提升,日本人试图在移民等国际事务中争取比其他亚洲民族更加优越的地位,以彰显他们在亚洲的与众不同和文明的“先进性”。然而,在美国愈演愈烈的排日浪潮冲击下,这种民族自尊心被击得粉碎。时任日本外务省次官埴原正直在给美国国务卿休斯的信中直言“关键之处是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有没有获得他

① 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9, p. 133.

② Ronald Takaki,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Boston: Little Brown, 1989, p. 205.

国的正式尊重或关注……（排斥移民条款）所呈现的是不把日本当作一个国家看待，在美国人民眼中，日本人已被丑化为一文不值，弃之亦毫不足惜。”^①日本政府甚至将美国《1924年移民法》的生效日期7月1日定为“国耻日”。另一方面，美国的排日运动也促使日本政府反思之前对外移民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在客观上推动着其移民重心向巴西转变。

受美国排日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巴西国内也出现了排日活动，但与美国相比，巴西的种族关系和社会环境总体上比较缓和。20世纪20年代初，巴西国内的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势力卷土重来。他们一方面批判巴西南部的德国移民和在城市经商的葡萄牙移民，称其垄断巴西的商业并传播极端思想；另一方面抨击黑人和日本移民，称其不易被同化。排日群体将日本移民高度聚居和同质化的特征视为其强烈民族主义的表现，认为日本移民具有扩张企图，他们一旦有了立足之地，就会轻而易举地占领民族主义情感仍然脆弱、社会较为分裂的巴西。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移民的回归似乎意味着巴西不再需要日本移民”^②，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排日声浪。在这种情况下，1923年巴西联邦议会通过了《雷斯法案》。不过，该法实施不足3年便被废止。这说明，在巴西，排日的种族主义群体仍属少数，也体现了现代巴西民族主义的文化包容性。^③

日本军官春见京平曾称，巴西人享受着真正的平等，黑人和白人可以同时乘坐轮船和火车，同时观看演出和电影，所有种族能够平起平坐，谁也不主宰谁，都是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更加重要的是，他还强调非巴西人也有权购买巴西土地。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教授高岗熊雄也称赞巴西的种族关系比北美好得多，因为这里有大量的混血种人。圣保罗州一份日文报纸的社论写道，包容和国际主义是维系日本人和巴西人关系的纽带，这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种族主义和自私形成了鲜明对比。^④这也为此后日本政府大规模向巴西输送移民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社会环境。

总之，20世纪20年代初日本政府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在国内，为了缓解人口压力、解决社会矛盾和恢复统治秩序，日本政府有向海外转移贫民和灾民的主观需要，内部存在巨大的“推力”。在国际上，美国《1924年移民法》为日本向美国的移民活动画上了句号，同时也让日本人看清了美国紧张的种族环境。与之相比，巴西虽然偶尔出现排日运动，但总体而言仍然保持包容、宽松的种族氛围。更重要的是，美国和巴西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待外来移民的政策自然有所差异。美国自立国后的一百多年间，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引进大量劳动力，因此采取了鼓励自由移民的政策。然而，20世纪初，伴随着西部开发的完成、基本实现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以及本土人口的快速增加，美国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大幅下降，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特定人群移民的法案，收缩移民政策，排日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而此时的巴西，工业发展方兴未艾，仍处于早期工业化阶段，存在较大的劳动力缺口，这就为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向和后续输出提供了客观环境和巨大的“拉力”。历史为日本移民关闭了一道北美的大门，同时也打开了一扇南美的窗户。由此，日本政府根据国内外局势，开始酝酿出台新的移民政策。

二、日本“国策移民”政策的确立

1921年，高桥是清出任日本首相。他早年成立移民拓殖公司，亲身参与了向秘鲁的移民活动，是日本政府中极力主张移民南美的高官。同一年，日本政府设立内务省社会局，主要负责处理国内的

① 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李朝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8页。

② Daniela de Carvalho, *Migrants and Identity in Japan and Brazil: The Nikkeijin*,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5.

③ 杜娟《〈雷斯方案〉与20世纪20年代初巴西的排日活动》，载崔忠洲主编《中国与拉美》第2辑，北京：朝华出版社，2022年，第61-79页。

④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p. 66-67.

失业问题和社会问题。社会局对国内问题和移民问题进行统筹考虑,积极推进海外移民活动。1922 年 4 月 21 日,内务省召开移民事务专项会议,与会代表对向拉美输出移民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并达成一致,将向拉美移民视为日本反贫困、反失业的重要举措。^①8 月 1 日,内务省进一步提出了《移民保护奖励案》。该案认为,用对外关系来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和失业问题是最佳良策。

巴西国土广袤,是日本本土面积的 22 倍,其东南部的圣保罗州更是物产丰富,且对外国移民给予保护,是日本最适合移民的地方。此前的 39 年中,日本移民的主要移居地是北美加州,在留日本人已近 7 万,其中日本移民所占地仅为 11 800 町步,此时移民却被限制入境。而与此相比,在此前的 13 年间,已有 3.5 万余人移居巴西圣保罗州,所占田地已达 67 000 余町步。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西可谓日本最理想的移民目的地。要振兴对巴西的移民事业,就要确立日本政府援助的方针。在人口调节措施和临时实施的失业保护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应奖励移民事业,以此来解决上述问题。相关文件指出,日本政府应对经营移民事业的公司附加适当条件,给予奖励资金,以期能彻底普及移民事业。在拓殖地建设方面,应完善教育机构和卫生设施,还要同步推进法律咨询,为保护移民产业提供支持,要对移民提供适当的渡航费用或房屋建筑和生活补贴。^②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内务省主张对移民活动提供补助,补助金主要用于传播移民和拓殖项目的知识、建立医疗卫生和教育设施、资助移民的旅行费用、房屋建设和生活费用等,资助对象除了移民公司(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和移民个体之外,还包括移民前的宣传活动及移民后的安置保障等。然而,对于是否应该官方资助移民活动,日本政府内部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作为移民事务的管理机构,日本外务省并不支持内务省奖励移民的提议,尤其对资助移民个体表示反对,认为政府的资助不会导致移民数量的增加,反而可能对外交关系产生消极影响。鉴于此,1923 年日本内务省并没有划拨专项资金补贴移民的交通费用,而只是向海外兴业株式会社提供“手续费免除奖励金”,即向每个成年移民提供 35 日元的航行佣金,之前这笔费用是由移民自己承担的。同时,日本政府从财政预算中划拨 40 万日元用于移殖事业。^③

1924 年,日本内务省开始打破政府不资助移民个体的常规。其一,为了安置关东大地震中的灾民,社会局 2 月宣布给予年满 12 岁以上、希望移民海外的地震灾民每人 200 日元的船费补贴,帮助他们前往南美。受此资助,首批 110 名灾民被运送到巴西。其二,作为 1 月 26 日裕仁皇太子和良子结婚的纪念活动之一,日本政府以每人 300 日元的标准全额资助 200 名移民前往巴西,这批移民乘坐“加拿大丸”于 7 月 31 日抵达桑托斯港。^④此外,日本政府加大了对海外移民活动的支持力度,将移民经费预算提升至 120.88 万日元,是上一年的三倍多,在国民预算中的占比也从 1923 年的 0.003% 增加到 1924 年的 0.07%。^⑤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日本内务省对向巴西输送移民越来越重视,日本政府对移民事业的资助金额也不断增多,但日本政府仍未将巴西提升为海外移民首要目的国,日本社会局对移民的资助也只是一项临时性举措,且政府内部对此仍存在争议。然而,这一切很快因美国《1924 年移民法》的出台而发生转变。

为了应对这一重大国际事件,4 月至 6 月,日本政府汇集内阁、外务省、内务省和移民公司等各方代表,召开了帝国经济会议。会议首先分析了日本的经济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日本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不成比例,然其狭长之地用于农耕,不宜居住,而宜居之地所占部分比例很少,故

① Toake Endoh, *Exporting Japan: Politics of Emigration to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 67.

② 「移殖民保護奨励に関する内務省案」,1922 年 8 月 1 日, <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50.html>.

③ Toake Endoh, *Exporting Japan: Politics of Emigration to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 69.

④ 入江寅次『邦人海外発展史』上、東京:原書房、1981、292 頁。

⑤ 坂口満宏《论日本向巴西移民的性质与形式》,吴占军译,《日本研究》2016 年第 2 期; Toake Endoh, *Exporting Japan: Politics of Emigration to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 68.

粮食匮乏,生活之必需品也比较短缺”,同时1912—1921年“年均增长69万人口”。

面对人口过剩、失业和农村问题,会议决定大力推动海外移民。由于之前最重要的移民链条已被美国切断,日本移民应该去往何方以及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成为此次会议着重探讨的内容。会议设立了社会部拓殖部联合部特别委员会,石塚议员担任委员长。该委员会下设国内移民分委员会和国外移民分委员会。关于移民目的地的选择,两个分委员会评估后得出结论:北海道是日本国内移民最理想的居住地,而南美洲特别是巴西则是最合适的海外移居地。自此,巴西被日本政府确定为海外移民的首要目的国。同时,这次会议明确提出,日本政府应充分利用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在向南美移民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并加大对该移民公司的扶持力度。

会议形成了《特别委员会第八号保护奖励移殖民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北海道移殖民保护奖励方案,二是海外移殖民保护奖励方案。对于海外移民,《决议》特别强调“劳资相伴”的移民模式,提出应设立以殖民、投资和金融为目的的拓殖会社。《决议》对拓殖会社的业务、组织、资金、政府的资助方法和额度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该会社的业务包括移殖民事业、投资业务、产业设施、金融设施和公益设施五类。具体而言,移殖民事业的发展应与移居国的投资相结合,与拓殖事业紧密相关的工业、矿业、林业、铁路业等都需投注适当资本,且为非公司的日本人企业家提供各种其他便利以期招徕其他投资。三是为了有效处理移住者生产的产品,避免其努力最终归于徒劳,还须发展仓库业、产品加工业等。应熟悉移居地的状况,了解移居者的信用状态,拓殖会社可以兼营金融事业。设立产业研究所,从事农业、矿业、林业等相关研究,为一般移民者和企业家提供指导建议。此外,还为移民子弟建设学校等教育机构,修建医院和娱乐设施,以慰劳救助在异地劳作的国民。^①

在组织方面,日本政府机关对会社的监管应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且不能对董事会决定选任的重要职位有所异议。特别是对于在巴西的拓殖事业,要视其国情进行灵活处理,使其经营不受其他干涉。同时,会社可根据开拓殖民事业和相关各种产业的现实需要,设立子公司,并选择巴西人为其股份持有人,以此来开拓两国共同合作之路。这样,既可以推进日本在巴西的劳资投入事业,也可以避免产生国民无用之误解。

在移民的资金和资助方面,会社资本至少需3000万日元,而鉴于移民事业至少需要10年才可见利,民间集资是行不通的,因此日本政府至少需要为公司提供5年以内的3000万低利息贷款,并限定按年偿还,必要时可延长偿还时间。另外,日本政府在会社创立后,至少在10年内对公司营业缴纳金按照年8%的比例提供补助金。对于本公司商法规定的例外情况,必须募捐5倍以上的社会债券进行融资,且政府应保证本金和利息一并支付。

《决议》还列出了日本海外移民事业中9个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移民教育的重点应设为启发海外思想涵养,或宣传及讲解招募迁移殖民的方法。二是政府应当对移居者进行适当补助。三是应对移民中心的设置、海外移居者的培训以及出发和达到等相关配套设施进行改良。四是改善移民运输船的设备,提高运输速度,优化航路。五是注重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考察移入国的国情和民情,并与外交活动相配合。六是适当修订现行移民法规,以匹配移民保护奖励政策。七是对海外移住者可通过简单手续延长待服兵役的时间,或推行免除服兵役的利好政策。八是海外移住者应该在移居国永久居住,接受同化,成为守法国民,政府要解决双重国籍的问题,也要制定迁居者归化的方针。九是要完善海外移住事务的行政机关,并赋予其灵活性。此外,为了审议移殖民计划、拓殖、

^① 水野为三郎、水野春之助『帝国経済會議社会部拓殖部聯合部會議事速記録(第二回)』,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53.html>。

金融等移民的主要事项，可酌情请有学识经验者成立移民委员会。^①

此次会议还分析了美洲排日运动频发的原因，并就如何避免在巴西引起反日情绪和保护日侨给出了指导意见。会议认为，“寄居客”心理是导致美洲国家的日本移民被孤立和隔离的主要原因，继而催生出不可同化论，具体表现为拒绝接受文化融合和拒绝成为侨居国公民。因此，提高移民群体的教育水平和完善行前培训可有助于降低潜在的种族歧视。更为重要的是，移民要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尊重移住国的风俗文化和宗教信仰。同时，日本政府会建立健全侨民的文化设施，让他们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否则，如果新建立的日本拓殖地仍然与巴西主流社会相隔绝，那么同样的文化和种族仇恨会再次上演。

简言之，1924 年帝国经济会议是日本政府移民政策的顶层设计，为后续推行“国策移民”指明了方向。这次会议确定了“共存共荣”的海外移民政策方针，即日本向巴西输送劳动力和资本，以促进巴西边远地区的开发和繁荣。

与此同时，日本在拉美地区的一系列外事活动也预示着其海外移民政策的巴西转向。1922 年，日本政府派遣三艘巡洋战舰参加巴西独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之后，日本海军上将对秘鲁进行了正式访问，受到秘鲁总统的接见。此次远洋航行和舰船外交传达了日本准备在这一地区扩展移民事业的意愿，并期盼这些国家能够敞开怀抱接纳日本移民。作为日本海外移民的主管部门，外务省也密切关注着拉美地区的移民形势。1923 年 5 月，日本驻巴西最高外交代表被升级为大使，里约热内卢的领事馆也升级为大使馆，此举反映出日本政府对发展日巴关系的重视。

1924 年 3 月至 10 月，日本内务省社会局书记官富田爱次郎前往巴西、智利、秘鲁等南美多国进行考察。在巴西考察期间，他同圣保罗州农务长官加布里埃尔·里贝罗·多斯桑托斯（Gabriel Riberiro dos Santos）、圣卡塔琳娜州殖民农务长官卡斯坦西亚·里梅尔（Castancia Riummel）和南里奥格兰德州土地局长托雷斯（Torres）进行了会谈，并前往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经营的伊瓜佩拓殖地和西北沿线的拓殖地，对日本移民咖啡和稻米栽培情况，以及宗教、教育、保健卫生、金融机构和娱乐设施等状况进行考察。回国后，他撰写了详尽的调查报告。在比较南美诸国的移民环境后，他对巴西“地大物博、人口稀缺、土地易得”的印象深刻，称其为“最适宜农业移民的国家”。他指出，巴西的工业发展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建议日本政府增加对巴西的农业和工业投资。此外，他还提出要改造移民会社、改善移民船的条件，并设立金融机构。富田爱次郎的考察报告对后续日本“国策移民”各项事业的推进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②

1925 年，日本外务省派官方代表团到南美进行访问。代表团深入巴西的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进行考察，与两州政府领导和地方官员进行座谈，就日本移民的发展前景问题进行沟通。代表团一致认为，巴西各州是日本向外移民和进行农业垦殖的最理想目的地，因为这里拥有接纳日本移民的友好社会环境。日本官员的频繁到访表明，巴西等南美国家在日本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这些精心安排的外交活动也意味着“日本向南美乃至世界宣布其新型国际移民计划全面启动”^③。这一时期，日本和巴西之间的经贸关系迅速升温。1925 年初，日本外务省、东京府和东京商会提出要从巴西进口 60 吨商品，包括咖啡、可可、棉花和钢铁，同时日本向巴西出口同等规模的工业制成品，双方的外交官都倾向于将贸易和移民问题进行捆绑。^④

① 『帝国経済會議ニ於ケル移民ノ保護奨励方策ニ関スル諮詢並答申』，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54.html>。

② 富田爱次郎「伯刺西爾移民ニ就テ」『大野緑一郎関係文書 751』，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http://www.ndl.go.jp/brasil/text/t051.html>。

③ Toake Endoh, *Exporting Japan: Politics of Emigration to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 68.

④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5.

在海外移民政策彻底转向巴西后,日本政府不断完善其国内的移民机构,重点资助海外兴业株式会社,并支持建立了海外协会、海外移住组合等诸多移民组织和机构,使这一时期的日本海外移民活动呈现出多层次、立体化的面貌。此外,日本政府还致力于扩大宣传和招募、保障行前准备、改善航行生活以及优化到达服务等移民活动的配套工作。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越来越多的日本移民来到巴西,且人数呈不断上升的态势。巴西的日本移民1924年为2673人,1925年增加到6330人,1926年增加至8407人,1929年攀升到16648人,1933年和1934年均突破20000人。^①但1934年巴西国会通过《百分之二限额法案》^②后,从1935年起日本移民人数大幅减少。因此,从历史上看,1924—1934年可被视为日本向巴西移民的高峰期。

三、比较视野下日本向巴西移民高峰期的特征

如果与1908—1923年日本向巴西移民的初期相比,可以发现1924—1934年移民高峰期既有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存在调整和转型,能够凸显日本“国策移民”时期移民活动的一些特征。

一方面,在移民身份、移民模式、移民来源地和居住地地理分布方面,移民高峰期与移民初期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首先,在移民身份方面,农民占绝大多数。1908—1912年农民占比为85.9%,1913—1917年提升至92%,1928—1932年则达到94.5%。^③

其次,在移民模式方面,男女搭配的家庭移民仍然是移民的主体,且占比越来越高。1908—1917年2人及以上人数的家庭占比为78.9%,1928—1932年提升到81.1%。值得注意的是,5人以上的大家庭移民比例呈逐渐升高的趋势:1908—1917年5人家庭移民占比为4.7%,1918—1922年升至7.2%,1923—1927年增加到12.1%,1928—1932年继续增长达13.5%。6人家庭移民占比由移民之初即1908—1917年的1.1%陡升至1928—1932年的10.8%;7人家庭移民占比也从0.6%增加到8.1%;9人家庭移民占比则从0增长至3.2%;10人家庭移民占比由0.3%提高到4.1%。^④这说明,来往巴西的日本移民的家庭规模在逐渐扩大。

再次,在移民来源地方面,日本西南部依旧是移民输出的主要地区。在移民初期的1908—1923年,共有32590名日本人迁移至巴西。其中,来自冲绳县的移民最多,达5680人,占同期移民总数的17.4%。位于日本西南部的福冈、熊本、广岛和鹿儿岛四县位列其后,共计输出13912名移民,接近移民总数的一半(42.6%)。^⑤至1924—1935年,日本共向巴西输送移民132121人。^⑥移民人数排在前五位的分别为熊本、北海道、福冈、广岛和冲绳,熊本县取代冲绳县成为输出移民最多的县。这五个一级行政区中,除了北海道,其余四个都是日本传统的海外移民大县。可以看出,西南地区仍然是日本移民输出最为集中的区域。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西南地区的日本人擅长渔猎,以涉水为生,富于冒险精神。他们往往不安于现状,寻求在

① Maria Stella Ferreira Levy, “O Papel da Migração Internacional na Evolução da População Brasileira (1872 a 1972),” *Revista de Saúde Pública*, supplement, Vol. 8, No. 3, 1974, pp. 49–90.

② 1934年5月24日,巴西国会就宪法修正案提案有限制外国移民的条款进行表决,最终以146票赞成、41票反对,通过了米格尔·德奥利维拉·科托提出的议案,并作为第121项条款列入《1934年宪法》。该法规定,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1884—1933年间该国已经在巴西生活人数的2%。因此,该法又被称作《百分之二限额法案》。该法确立了国籍来源的移民配额制度,参见杜娟《巴西排日运动与1934年〈百分之二限额法案〉的颁布》,《史学集刊》2024年第2期。

③ Teiiti Suzuki, *The Japanese Immigrant in Brazil: Narrative Part*,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64, p. 192.

④ Teiiti Suzuki, *The Japanese Immigrant in Brazil: Narrative Part*,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64, p. 192.

⑤ Teiiti Suzuki, *The Japanese Immigrant in Brazil: Narrative Part*,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64, p. 172.

⑥ Maria Stella Ferreira Levy, “O Papel da Migração Internacional na Evolução da População Brasileira (1872 a 1972),” *Revista de Saúde Pública*, supplement, Vol. 8, No. 3, 1974, pp. 49–90.

海外进行开拓。这与作为日本历史和文化核心的畿内地区民众注重家庭、温顺、友善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二，西南地区是日本传统的农业区，工业不发达，经济条件差，底层的农业人口众多，生存压力大。尽管西南地区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密度并非日本最高，但其人口增长数量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地区资源所能承受的上限，而这些新增人口往往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民。以广岛为例，1905 年广岛人口中小农的比例高达 70%，人均财富仅为 381.895 日元，低于日本平均水平 505.755 日元，属于日本比较贫困的地区。迫于生存压力，人们不得不到海外谋生。

其三，西南地区的日本人具有丰富的移民经验。在向拉丁美洲移民之前，该地区已经有数十年向夏威夷和北美地区移民的历史。在长期的跨太平洋航行和移民生活中，当地民众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西南地区由此成为日本海外移民的传统来源地。

最后，在移民在巴西的地理分布方面，圣保罗州仍旧是日本移民在巴西最重要的聚居地。从总体上讲，在向巴西移民的最初 5 年间，82.6% 的日本移民居住在圣保罗州，1928—1932 年这一比例增加到 91%。具体到圣保罗州内部，有一些变化值得关注：在高峰期，老咖啡产区的日本移民占比要比初期少很多。1908—1912 年有 34.5% 的日本移民在老咖啡产区工作，这一数值在 1913—1917 年达到顶峰，而后逐渐下降，至 1928—1932 年仅为 16.1%。老咖啡产区流失的日本移民为西北铁路沿线、阿尔塔保利斯塔和索罗卡巴纳地区的日本人农业拓殖地所吸纳，50.4% 的日本移民都居住在这三个地区。西北铁路沿线的日本移民占比从最初的第四位 6.3% 上升到第一位 35.3%，阿尔塔保利斯塔地区和索罗卡巴纳地区的增幅也很显著，占比分别从 0.3% 和 1.3% 提升至 7.5%（第四位）和 7.6%（第五位）。^①

另一方面，移民高峰期日本移民的资金来源和移民类型与移民初期有诸多不同之处。

在资金来源方面，日本政府提供了主要的经费支持。20 世纪 20 年代初，为应对国内外双重压力，日本政府将向外移民问题同国内反贫困和反失业进行有机结合，确立了保护和奖励海外移民的政策。日本政府的移民经费预算从 1923 年的 40 万日元增加到 1932 年的 981 万日元，10 年间增长了近 25 倍。在资金支持方面，日本政府不仅减免了移民出发前所有的滞留费用以及航行旅费，为移民提供低息贷款，帮助他们在巴西购地。此外，日本政府还对移民公司和轮船公司在招募和运输移民过程中产生的费用进行补贴。

在规划和服务方面，日本政府不但致力于扩大宣传和招募、保障行前准备、改善航行生活和优化到达安置等各环节的工作，还通过日本驻巴西大使馆和领事馆指导和帮助海外移住组合联合会及民营公司的投资置地活动。日本政府在移民事务中再次从幕后走到台前，直接资助、指导和规划移民活动，对移民活动进行多层次和全方位的介入。

19 世纪晚期，日本的海外移民政策经历了由政府主导的“官约移民”向民营移民公司经营的“私约移民”的转变。那么，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国策移民政策的出台是否可以被视为“官约移民”的回归呢？事实上，日本政府一直掌握着海外移民活动的决定权，只是在“私约移民”阶段退居幕后，让移民公司具体运营行使执行权，表现出“大公司、小政府”的运行模式。19 世纪的“官约移民”时期和 20 世纪的“国策移民”阶段，日本政府的主导地位则更加突出，表现出“大政府、小公司”的运行特征。就移民动力而言，在“官约移民”和“私约移民”时期，以夏威夷、北美、巴西等输入国弥补经济发展劳动力不足的“拉力”为主，而在“国策移民”时期，则以日本政府加强人口和资本输出的“推力”为主。从这个意义上讲，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哪一方的动机更加强烈和紧迫，哪一方就会成为移民活动的主要推动者甚至是资助方。此原则尤其适用于日本和巴西。

除了输出国和输入国在移民动力上出现转移外，日本国内主管移民事务的机关也发生了改变。之

^① Teiiti Suzuki, *The Japanese Immigrant in Brazil: Narrative Part*,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64, p. 200.

前,所有移民公司想要开展海外移民活动,都必须取得外务省的许可和授权,否则将被视为非法行为。1921年设立的社会局主张对海外移民实施补助,推行积极的移民政策,并将其视为解决国内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外务省对此持有异议,持保守立场。随着日本政府补贴移民政策的出台,社会局作为具体执行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内务省遂取代外务省成为日本海外移民的主管部门。这也反映出对外移民与日本国内事务的密切关联。1929年拓务省设立,全面负责管理日本的海外移民开发和殖民地行政,移民主管机构再度发生变更。

日本向巴西移民的主体是以定居为目的的自耕农,从早期向巴西输出契约劳工型移民转向输送独立身份的小农,“日本移民将成为19世纪末巴西实证主义者所要求的农村中产阶级”^①。日本移民在圣保罗州占有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多,1920—1934年,巴西本土居民拥有土地的面积增加了2倍,达到1750万公顷;意大利移民和西班牙移民的占地面积分别增加了3倍和5倍,达到350万公顷和109万公顷;日本移民则从37912公顷增至1014206公顷,增长了近30倍,成为该州的第四大土地拥有者。^②

日本移民类型的转变反映出日本政府在经营海外移民事业时心态的变化。在以契约劳工为主的移民时期,日本政府总是强调移民对国家和天皇的忠诚,而移民个体也是抱着“契约期满、衣锦还乡”的心态,居住国仅是他们淘金的驿站。到移民高峰期,日本政府倡导移民在居住国归化入籍,输出以永久居住为目的的移民群体。在日本政府看来,加大对巴西的移民力度可以实现一举多得的效果。定居型移民既可以缓解日本国内劳动力过剩的问题,日本移民的侨汇还能帮助日本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低迷状态,移民外交也可增进日本和巴西以及其他南美国家的贸易往来,推动日本海运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以定居促融合,能够改善传统日本移民“寄居客”的负面形象。1933—1937年,前往巴西的日本移民家庭中,59%的户主都是30岁及以上成熟稳定的壮年男性,45%的家庭为5人及以上的大家庭,单身移民比例大幅缩减至18.9%,而子女和父母在家庭中的占比猛增至50.8%。^③这些数据都说明日本政府决意推动定居型移民的事实。

移民类型的转变还意味着,日本海外移民告别了近代以来单一输出契约劳工的时代,转向移民与海外投资开发并举的新阶段。日本政府和民间资本合作,大肆在巴西购地拓荒,积极推进自耕农形式的“企业移民”,企图借此将巴西等接受日本移民的国家(拓殖地)打造成其海外扩张的后方基地,为其提供原料和商品销售市场,以这些国家优良的自然禀赋弥补日本资源匮乏的先天不足。在这个新阶段,“海外移民已经不再是为了谋生和营利的个人选择,而成为一种(日本)人民情感的集体表达,承担着关乎民族进步的社会责任。这种民族主义野心深藏在释放人口压力的华丽辞藻中。所以,向拉美移民是日本民族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④。

四、余论

1924—1934年日本政府不断优化向巴西的移民活动,移民人数不断攀升。在移民早期(1908—1923),日本共向巴西输出移民32590人,其中输出5000人以上的县只有1个,1000—5000人的县有6个,100—1000人的县有25个,1—100人的有14个,还有1个县没有移民输出。而此后的12年,日本移民人数出现爆发式增长,总人数为前一阶段的4倍多,其中3个县的移民数突破万人大

^① Daniel M. Masterson, “The Japanese in Peru and Brazil: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Samuel L. Baily and Eduardo José Miguez, eds., *Mass Migration to Modern Latin America*,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2003, p. 124.

^②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cmillian, 2002, p. 115.

^③ Teiiti Suzuki, *The Japanese Immigrant in Brazil: Narrative Part*,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64, pp. 189–192.

^④ Toake Endoh, *Exporting Japan: Politics of Emigration to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 77.

关,4 个县的移民数在 5000 至 10 000 人之间,31 个县移民数在 1000 至 5000 之间,剩余的 9 个县为 1000 人以下。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阶段移民最不活跃的山梨县(0 人)、青森县(4 人)、宫崎县(8 人)和岩手县(28 人)在这一时期都表现出了踊跃的态势,山梨县实现零的突破达到 1314 人,其他 3 个县的移民人数分别暴增了 206 倍、202 倍和 78 倍。^①从整体上看,日本所有 47 个一级行政区全部参与了此次移民运动。这也是日本“国策移民”举国之力全面推动向外移民的表现和结果。

经过 10 年持续不断的移民活动积累,日本和巴西在彼此移民政策中的重要性大为提升,巴西成为日本海外移民的首要目的国。1924 年召开的日本帝国经济会议确定将海外移民的流向从北美地区(美国)转至南美地区(巴西)。1921—1930 年,日本共向海外输出移民 160 049 人。拉丁美洲取代夏威夷,成为最受日本移民欢迎的地区,吸引了半数以上的日本移民(85 342 人),其中 83%(70 913 人)的移民前往巴西,另有 10.7%(9172 人)、2.5%(2141 人)和 2.4%(2100 人)的移民分别奔赴秘鲁、墨西哥和阿根廷;亚洲和南太平洋地区位列第二,有 26 333 人;美国本土(16 105 人)、夏威夷(12 484 人)和加拿大(8603 人)分列第三、第四和第五位。^②巴西的日本移民人数遥遥领先于排在第二至第五位的国家和地区,甚至超过它们的移民总和,占同期日本移民总人数的 44.3%,其首要目的国的地位不可撼动。

与此同时,日本也成为巴西的第二大移民来源国。从总数上看,1924—1934 年,巴西共接收外来移民 783 250 人。其中,葡萄牙仍然稳居榜首,达 242 381 人,占外来移民总人数的 30.9%;日本脱颖而出,跃居第二位,共输送了 132 121 人,占比从移民初期的 2.5%猛增至 16.9%;其后是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它们分别贡献了 72 684 人、65 357 人和 53 834 人。从此,近代以来南欧三国长期主导巴西外来移民的局面被日本打破。从单个年份看,1928 年,日本向巴西的移民人数首次破万,成为当年仅次于葡萄牙的第二大移民来源国;1932 年,日本第一次超越欧洲国家,成为当年向巴西贡献移民最多的国家,占比高达 37%;1933 年,日本的单一年份移民人数达到峰值,共向巴西输送了 24 494 人,也就是说,这一年巴西外来移民中一半以上(53%)都来自日本。^③居住在巴西的日本移民 1925 年为 49 400 人,1930 年为 116 500 人,到 1935 年达 193 000 人,是 10 年前的 4 倍。^④随着巴西日裔人口规模的不断膨胀,日本政府新设了许多驻巴西的外事机构来管理日益复杂的移民事务。1925 年,日本政府在巴西亚马孙州首府玛瑙斯任命了名誉领事。1927 年,日本驻圣保罗总领事馆在桑托斯设立了办公室。为了更好地服务和指导日本公司和移民在北部亚马孙地区的拓殖活动,1934 年日本政府又分别在帕拉州和亚马孙州开设了领事馆。^⑤日本移民成为巴西国内不容小觑的少数族裔团体,并在巴西的经济社会生活和巴日两国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刘 莉

① Teiiti Suzuki, *The Japanese Immigrant in Brazil: Narrative Part*,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64, p. 172.

② Toake Endoh, *Exporting Japan: Politics of Emigration to Lati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 18.

③ Maria Stella Ferreira Levy, "O Papel da Migração Internacional na Evolução da População Brasileira (1872 a 1972)," *Revista de Saúde Pública*, supplement, Vol. 8, No. 3, 1974, pp. 49-90.

④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mmigrants, Minorit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7.

⑤ Stewart Lone, *The Japanese Community in Brazil, 1908-1940: Between Samurai and Carniva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72.